

汉语方言中的若干逆语法化现象*

吴福祥

提要 本文讨论汉语方言里四种逆语法化演变,即“并列连词>伴随介词”“处所介词>处所动词”“与格介词>给予动词”和“比较介词>比拟动词”。作者认为这些逆语法化的发生与汉语的类型特征密不可分,质言之,上述特异的语法演变归因于汉语特异的结构类型。

关键词 逆语法化 语法化 汉语方言语法

1. 引言

语法化是人类语言普遍可见的语言演变现象,也是语言演变特别是语法和语义演变的规律性过程。在以往的语法化研究中,语言学家除了揭示大量的语法化现象外,也发现少数违逆语法化原则的“去语法化”或“逆语法化”现象。这些研究无疑加深了我们对语言演变性质和机理的认识。

本文利用汉语方言的资料,讨论汉语中与介词相关的几种逆语法化过程,并尝试从话语规约和语言类型的角度对这类逆语法化现象进行解释。

2. 语法化、去语法化与逆语法化

2.1 语法化

“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是指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产生、形成的过程。典型的情形是,一个词汇项或结构式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获得某种语法功能,或者一个语法化了的成分继续产生新的语法功能。(参看 Hopper & Traugott, 2003: xv)

典型的语法化过程通常包含语用-语义、形态-句法和语音-音系三个子过程(吴福祥, 2003a)。一般说来,语用-语义过程体现为“去语义化”(desemanticalization),形态句法过程表现为“去范畴化”(deategorilization),语音-音系过程则实现为“销蚀”(erosion)。按照 Heine 的看法,去语义化的发生通常先于去范畴化和销蚀,并且是导致后二者发生的主要因素。(Heine & Reh, 1984; Heine & Kuteva, 2002; Heine, 2003)

历时语法化研究有一个重要假设,即“单向性”(unidirectionality)。所谓单向性,简单地

* 本项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功能—类型学取向的汉语语义演变研究”(14ZDB098)资助。主要内容先后在第八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2015.10.31-11.1;北京)、第八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11.1-2;福州)、语法化世界词库工作坊(2016.11.12-13;北京)和第六届汉语语法南粤论坛(2016.11.25-28,深圳)上报告,作者由衷感谢 Bernd Heine、陈前瑞、洪波、李明、李炜、刘丹青、潘海华、杨荣祥、袁毓林等先生及《中国语文》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意见;友生金小栋女史帮助搜集相关资料,亦此申谢。文中错误作者自负。

说,是指语法化的演变以“词汇成分>语法成分”或“较低语法化>更高语法化”这种特定方向进行。比如在(I)所示的演变序列中,假如某个形态-句法演变只能按照由左向右的方向进行,那么就可以说这个演变是单向的,或者说不可逆的。反之则是单向性的反例。

I. 实义词 > 语法词 > 附着词 > 屈折词缀(Hopper & Traugott, 2003:7)

如上所述,一个典型的语法化过程包括语义-语用、形态-句法和语音-音系三个子过程,所以单向性通常在这三个层面都有表现(参看 Lehmann, 1995[1982]; Heine & Reh, 1984; Traugott & Heine, 1991; Hopper & Traugott, 2003; Fischer & Rosenbach, 2000; 吴福祥, 2003a):

II. 语义-语用:抽象性逐渐增加:具体义 > 较少抽象义 > 更多抽象义

主观性逐渐增加:客观性 > 较少主观性 > 更多主观性

形态-句法:黏着性逐渐增加:自由 > 较少黏着 > 更多黏着

强制性逐渐增加:可选性 > 较少强制性 > 更多强制性

范畴特征逐渐减少:多范畴特征 > 少范畴特征 > 完全丧失范畴特征

语音-音系:音系形式逐渐减少或弱化:完整的音系形式 > 弱化的音系形式

尽管几乎所有的语言学家(特别是功能学派语言学家)都相信单向性是语法化的典型特征,但大多数语言学家主张单向性只是一种强烈的倾向而非绝对的原则,只有少数语言学家对单向性持有极端看法。比如德国语言学家 Haspelmath 在《语法化为什么不可逆?》(Haspelmath, 1999:1043, 1046)一文中断言:“语法化,即词汇范畴成为功能范畴的演变,是压倒性不可逆的。典型的功能范畴从不会变成典型的词汇范畴,违背语法化普遍方向的次要演变是极其罕见的。”“语法化是不可逆的,只有极为罕见的例外。这就是说,我们几乎很难看到一个以这种方式演变的结构式:原先的语法成分获得了更多的句法自由、更大的语义丰富等等。换言之,去语法化是极受限制的。当我们只考虑典型的功能范畴(譬如标格的介词或者时范畴词缀)时,如果问它们能否历时地变成典型的词汇范畴,回答是‘不’。”

2.2 去语法化与逆语法化

Lehmann(1995[1982]:14)在论及语法化的单向性时,专门为一种跟语法化过程方向相反但他认为实际并不存在的演变创造了一个术语,叫“去语法化”(degrammaticalization)。按照 Lehmann(1995[1982])的说法,“去语法化”与语法化是一种镜像关系,即:

III. 语法化: 话语 > 句法 > 形态 > 形态-音位(morphophonemics)

去语法化:形态-音位 > 形态 > 句法 > 话语

Lehmann(1995[1982])在对若干文献提及的少数“去语法化”现象逐一辨析之后断言:“实际上至今并没有发现任何有说服力的去语法化现象存在。”(Lehmann, 1995[1982]:17)

Haspelmath(2004a:27-28)认为,文献中屡屡提及的“去语法化”现象很多并不能成为单向性的反例;另一方面,所谓的“去语法化”实际包含不同的次类,而这些次类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点。因此,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术语“逆语法化”(antigrammaticalization),这个概念指的是这样的一种演变:从一个可能的语法化终点返回到一个可能的语法化起点,而且同样也具有演变的中间阶段。比如从一个格后缀变为一个自由的后置词,并具有“后置附着词”(postpositional clitic)这一中间阶段。基于上面的分析,Haspelmath(2004a)认为只有逆语法化才可以被视为单向性的反例。

如果用 Haspelmath(2004a)“逆语法化”的特征来检视以往文献提及的单向性的反例,我们会发现,人类语言里真正的“逆语法化”现象是极为少见的,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可以用另

外的过程或动因来解释。^①

3. 汉语中的若干逆语法化现象

近年来,汉语学界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汉语的某些形态句法和语义演变也涉及不同程度的逆语法化(或“去语法化”)现象,譬如李宗江(2004)观察到汉语某些名量词(如“件”“只”“匹”)的“去语法化”(实义化)现象,张谊生(2011)注意到现代汉语“永远”“曾经”等副词的“虚词实化”(虚词>实词)以及“状”“样”“相”等粘着性构词语素的“语素词化”(语素>词),江蓝生(2012、2014)证实了部分西南官话数量词“两个”的“逆语法化”(并列连词>伴随介词)以及介词“跟”“给”的“实化”(处所介词>存在动词^②),等等。^③ 尽管其中有些结论或可再酌,但整体上这类研究使我们注意到汉语的语法演变除了自然的无标记演变外,也有一些特异的有标记演变;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汉语历史演变的了解。特别是江蓝生(2012、2014)的观察和分析给笔者以很多启发,本文的讨论很大程度上获益于江先生的相关研究。

3.1 并列连词>伴随介词

很多语言里,伴随介词往往演变为并列连词(参看 Haspelmath, 2004b、2007; Heine & Kuteva, 2002; 吴福祥, 2003b、2005)。例如汉语普通话的“和、跟、同”历史上都由伴随介词演变为并列连词,豪萨语的并列连词 *da* 源自伴随介词(Schwartz, 1989:32)。因为伴随介词的语法化程度低于并列连词,所以“伴随介词>并列连词”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典型的语法化现象,譬如 Haspelmath(2007:32)强调:“在所有我们具有历时证据的演变实例里,我们发现很多语法词和词缀所具有的‘伴随-并列’多义模式,都可以追溯到最初的伴随标记(comitative marker)的历时演变……理论上,我们也可以设想‘伴随-并列’多义模式导源于相反的演变过程,即从并列连接标记(coordinator)变为伴随标记,但这种演变过程显然从未发生。从伴随标记到并列连接标记的演变是一种普遍可见的语法化路径,就像其他语法化过程一样,这种演变过程也是单向性的。”

不过,在汉语方言里除了大量“伴随介词>并列连词”语法化演变,也偶尔可见“并列连词>伴随介词”这种逆语法化演变。例如在湖南、湖北境内的一些西南官话(如湖南慈利、汉寿、安乡,湖北仙桃、汉川市杨水湖、天门、武汉江夏等)里,“两个”除做数量词外还可以用作并列连词、伴随介词以及其它表示格关系的介词,例如:

(1) 湖南慈利通津铺话(储泽祥等,2006):

a. 并列连词:书记两个县长都来哒书记和县长都来了 (217)

排球两个篮球我都会打排球和篮球我都会打 (217)

煮饭两个炒菜他都搞不好煮饭、炒菜他都不行 (218)

① 普通语言学中关于“去语法化”和“逆语法化”的讨论,可参看 Ramat(1992)、Campbell(2001)、Haspelmath(1999、2004a)和 Norde(2009)等。

② 江蓝生(2012、2014)将表示处所、存在的动词称为“存在动词”,本文为表达的方便,除引用原文外一律称作“处所动词”。

③ 此外,张秀松(2014)论述了汉语史上“究竟”的“去语法化”(疑问语气副词>“原委,真相”义名词);罗耀华、周晨磊(2013)讨论了“抑”的去语法化演变(疑问句句末语气词>选择连词);宗守云(2012)提到类后缀“一族”的逆向语法化(类后缀>自由词>短语),张立昌、秦洪武(2011)论述了语气词“也”的逆语法化(句中语气词>副词),等等。

b. 伴随介词:你两个他比下子你跟他比一下 (220)

莫两个他讲话别跟他讲话 (220)

在湖北仙桃话里,这种兼做介词和连词的“两个”可弱化为“两”,甚至“两”较“两个”更为常用。例如:

(2) 湖北仙桃话(江蓝生,2012:302;朱怀,私下交流)

a. 并列连词:屋里冒得别个,只有我两(个)婆婆家里没别人,只有我和奶奶

b. 伴随介词:这件事要两儿子商量下。

c. 有生方向介词④:这个事情你要两(个)老师说一下

d. 关涉介词:这件事两我冒得关系

e. 比较介词⑤:她两(个)我差不多高

相较于慈利话,仙桃话“两个”的演化似乎走得更远:第一,音韵上“两个”发生了语音销蚀(erosion),省缩为“两”;第二,意义上“两个”作为介词发生了语义扩展(semantic expansion),除了伴随功能外还进一步发展出生有生方向介词、关涉介词和比较介词等功能。

原本是数量词的“两个”,何以发展出并列连词和伴随介词功能?“两个”的并列连词和伴随介词两种功能之间的演化方向是什么?江蓝生(2012)对这些问题做了很好的讨论。主要观点是:“两个”在蕴含并列义的同位短语结构式“X 两个”里由数量词演变为并列连词,然后进一步演变为伴随介词,即“X 两个>并列连词>伴随介词”。江蓝生(2012:302)特别指出,跟我们熟知的“动词>介词>连词”语法化常规顺序不同,数量词“两个”“这种特殊的语法化现象提供了一种由‘连→介’的逆语法化路径的实例”。我们赞同江先生的分析,假如将仙桃话“两(两个)”其他介词功能一并考虑进来,其演变路径当如下所示:

IV. “两个”的演变路径:数量词>并列连词>伴随介词 > $\left\{ \begin{array}{l} \text{比较介词} \\ \text{有生方向介词} \\ \text{关涉介词} \end{array} \right.$

正如以往的研究(Heine et al.,1991;Lord,1993;吴福祥,2003b)所证明的,伴随介词的语法化程度低于并列连词,因此上述“并列连词>伴随介词”这一演变过程,确如江蓝生(2012)所断言的,属于比较典型的逆语法化现象。

3.2 处所介词>处所动词

在汉语以及很多东南亚语言和西非语言里,处所动词通常演变为处所介词(吴福祥,2010)。譬如上古汉语的处所介词“於”、现代汉语的处所介词“在”以及埃维语的处所介词 *le*,历史上都源自处所动词(Pulleyblank,1986;Heine & Reh,1984)。因为处所介词的语法化程度高于处所动词,所以“处所动词>处所介词”是典型的语法化演变。不过在汉语方言里,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相反的演变,即“处所介词>处所动词”这种逆语法化演变。

3.2.1 跟

北京话中,“跟”与处所相关的用法有以下几种(引自陈刚,1985:90):

(3) a. 处所介词:他们跟街上站着呢

c. 源点介词:我刚跟乡下来

④ 这里的“有生方向介词”(preposition of human direction),指的是引介言说等行为所指向的有生对象的介词,有生方向介词所在句子的谓语指的是单方面的行为,譬如“这事你得跟你妈说一声”中的“跟”。

⑤ 这里的“比较介词”相当于平比介词,但一般只用于比较两个实体异同的句子。如普通话“张三跟李四一样(／相同／不同)”中的“跟”,这类比较介词在很多方言里同时也用作伴随介词。

b. 处所动词:他跟乡下呢

d. 经由介词:跟这儿穿过去

“跟”的“在”义处所动词用法是如何产生的?江蓝生(2014:489)认为是由“跟”的处所介词演变而来:“由介词‘跟’与处所名词组成的短语‘跟 NP’在北京话中主要是做处所状语……当‘跟 NP’不做状语,而是单独做谓语或句子主要成分时,‘跟’的句法功能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相当于存在动词‘在’……。”江先生将这种演变称之为“处所介词‘跟’的实化”。我们非常赞同这一看法,证据是:第一,在概念意义上,“跟”的处所动词用法与其“跟从”义动词相去甚远,而与“跟”的处所介词用法基本相同。^⑥第二,在句法条件上,我们比较容易给出“处所介词>处所动词”这一重新分析赖以发生的特定的句法结构式(即:省略 VP 之后的“跟 Loc. [VP]”结构式);相反,我们无法说明发生“‘跟从’义动词>处所动词”这一重新分析的句法条件。第三,在汉语方言里,“跟”的处所动词用法极为少见,目前发现除北京方言外“跟”的处所动词用法仅见于河北曲阳话(赵秀莉,2006)。但“跟”的处所介词用法在北京、黑龙江、河北、山东、山西、安徽等地的官话方言里则相对常见。考察表明,在“跟”具有处所动词用法的方言里,“跟”一定具有处所介词用法,如北京方言以及河北曲阳话(如(4));但反之则不然:很多方言里“跟”具有处所介词用法但并不具有处所动词用法(如(5))。换言之,我们所观察到的方言资料显示,“跟”的处所动词用法单向蕴含处所介词用法。可见,在“跟”同时具有处所介词和处所动词用法的方言里,“跟”的处所动词用法应源于处所介词用法而非相反。

(4) 河北曲阳话(赵秀莉,2006)

a. 处所介词:跟黑板上写字 (48) | 跟学校里念书 (49)

b. 处所动词:一个鸟儿跟树上哩 (48)

(5) 黑龙江方言(聂志平,2005:106):我昨儿个跟百货大楼看见他买了个洗衣机

牟平方言(罗福腾,1997:282):跟儿这坐着 | 能跟儿手上省,不跟儿口上省

栖霞方言(刘翠香,2004:129):别跟墙上写字

荣成方言(王淑霞,1995:197):跟家儿吃饭儿

莱阳方言(栾瑞波,2008:116):你就跟儿炕上专目珠儿好好躺着吧

左权方言(王希哲,1991:55):跟在黑板上写字

合肥方言(王菲宇,2012:15):大冬天,零下好几度,我跟在水里头泡着

3.2.2 挨

北京话读阴平的“挨”作为介词可表处所或源点,相当于普通话的“在”或“从”(傅民、高艾军编,1986:1;陈刚,1985:1;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1999:4744)。例如:

(6) 北京话(傅民、高艾军,1986:1;陈刚,1985:1):

a. 他挨工厂干活呢(陈刚,1985:1)

b. 你挨哪儿来(陈刚,1985:1)

但北京话“挨”又可以做处所动词:

(7) 老大挨家吗?(陈刚,1985:1)

(8) 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傅民、高艾军编,1986:1)

北京话“挨”的“在”义处所动词和处所介词用法如何产生的?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挨”的处所动词用法源自“靠近”义动词,然后又演化为处所介词,即“‘靠近’义动词>处所动词>处所介词”;另一种可能是“在”义处所介词来自“靠近”义动词,然后又演变为处所动词,即“‘靠近’义动词>处所介词>处所动词”。不过,第一种解释可能性很小,因为第一,在《现代

^⑥ 词典释义时无论是处所动词还是处所介词,通常都用“在”来训释,足见二者的概念意义相同。

汉语方言大词典》(李荣,2002:3077)“挨”字条所收42个方言点中,没有一个方言阴平的“挨”有处所动词用法,尽管这些方言中“挨”都有“靠近”义动词功能。另一方面,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的《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1999:4744)“挨”字条虽列有“在”义处所动词用法,但所举方言仅限于北京话。第二,有些方言阴平的“挨”具有处所介词用法,但并没有处所动词用法。例如:

(9) 毕节话(.ɲai阴平)(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1999:4744)

挨哪儿住家? | 挨黑板上写字

第三,据我们考察(金小栋、吴福祥,未刊),汉语方言的方所(经由、源点、处所、方向)介词有个重要的语源,即来自“依靠、靠近”义动词,而这类“依靠、靠近”义动词并没有与处所动词构成多义模式。例如:

(10) “依”(广西宾阳话“依”[ai²⁴],覃东生,2007:59-61)

- a. 处所介词:我依房看书我在房间里看书
- b. 源点介词:我队依北京来我们从北京来
- c. 经由介词:一把车依我侧边行过一辆车从我身边开过

(11) “靠”(山西闻喜话,任林深,1987:89)

方向介词:他撵你,你就靠往屋里跑 | 这担水要靠往水瓮合里里头倒

(12) “傍”:

- a. 经由介词:傍路边栽一缙桂花树沿着路边栽一行桂花树(湘潭方言,卢小群,2007:170)
- b. 源点介词:仁哪傍嗟假来你从哪里来?(资源延东直话,张桂权,2005:252)

因为,这些方言的“依靠、靠近”义动词并没有处所动词功能,因此可以肯定其方所介词用法应是直接由“依靠、靠近”义动词演变而来的。

基于以上证据以及3.2.1节“跟”处所动词用法来源的分析,我们推测北京话“挨”的处所介词用法是由其“靠近”义动词在“挨 N₁+V₂+(N₂)”(譬如“挨桌边吃饭”)这种连动式中演化而来的,而“挨”的处所动词用法则是由处所介词逆语法化而来,即:

V. 北京话“挨”的演变路径:“靠近”义动词 > 处所介词 > $\left\{ \begin{array}{l} \text{处所动词} \\ \text{源点介词} \end{array} \right.$

3.2.3 给

据苏晓青、吕永卫编(1996:173-174),徐州方言“给”[ke⁵⁵]具有处所介词和处所动词功能:

(13) 徐州方言(苏晓青、吕永卫编,1996:173-174)

- a. 处所介词:小孩儿给河那涯儿玩儿来小孩子在河那边玩儿呢 | 书包放给床上了书包放在床上了
- b. 处所动词:老五给家里了 | 孩子还给半路上来呢

江蓝生(2014)提到,开封话的“给”也有类似用法:

(14) 开封方言(江蓝生,2014:485)

- a. 处所介词:他给家做饭他在家做饭 | 他给学校打球来他刚才在学校打球
- b. 处所动词:他这会儿给家咧他这会儿在家呢,你快去找他吧

“给”作为给予动词何以产生处所动词用法?江蓝生(2014:490)认为徐州、开封方言“给”的处所动词用法是由处所介词演变而来。她把这种演变称为“处所介词‘给’的实化”,认为导致这种实化发生的原因是介词结构“给 NP”后谓语 VP 的省略,因为 VP 删略,原来的介词结构“给 NP”被重新分析为述宾结构,相应地“给”由处所介词重新分析为处所动词。我们赞成江先生的分析,换言之,“给”“处所介词>处所动词”这一演变也是比较典型的逆语法化现象。

3.2.4 从

山东、河北一带官话方言里,“从”除了源点介词外,还可以用作处所介词和处所动词:

- (15) 山东运河流域方言(张琳琳,2013:55-57)
- 源点介词:这间房从东到西不到三米 (56)
 - 处所介词:从黑板上写字 | 小强又从学校闯祸了 (57)
 - 处所动词:我从家里哩(东平) | 遥控器没从电视机上(邹城) (56)
- (16) 河北吴桥方言(阎浩然,2009)
- 源点介词:从吴桥到北京有五百里地 (36)
 - 处所介词:你哥从哪个学校教书啊? | 书从窗台上摆啁咪 (37)
 - 处所动词:碗从冰箱咪 (37) | 他从哪俩? ——从家咪 (38)
- (17) 德州方言(曹延杰,1991:181)
- 源点介词:他从学校往家走
 - 处所介词:他从地溜干活 | 书从桌子上放着
 - 处所动词:他这咱从哪海儿俩他现在在哪儿了? 从家俩在家里了
- (18) 济南方言(钱曾怡,1997:314)
- 源点介词:从济南到上海
 - 处所介词:从黑板上写字 | 从家里吃饭
 - 处所动词:你爸爸在家不在家? ——从家。

上述方言“从”的处所动词用法从何而来? 我们认为极有可能是源自“从”的处所介词功能,而演变的直接诱因也是“从 NP”后 VP 的省略。证据是:第一,在我们调查的“从”具有处所动词用法的方言里,“从”都具有处所介词用法,但反之不然。第二,在上举“从”具有处所动词用法的方言里,“从”是黏着性的,使用时必需带上处所宾语,单独一个“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用。比如在山东运河流域方言(张琳琳,2013:55-57)和河北吴桥方言(阎浩然,2009)里,(19)和(20)中前一答语均不成立,合法的回答是答语二:

- | | |
|----------------------------|--------------------------|
| (19) 山东运河流域方言(张琳琳,2013:56) | (20) 河北吴桥方言(阎浩然,2009:38) |
| 你爸爸从家吗? —— * 从 | 明天晌午你从家曼? —— * 从 |
| ——从家。 | ——从家。 |

这种句法限制说明“从”的处所动词用法尚未发展成熟,还保留处所介词的部分特性(比如不允许悬空),另一方面也证明“从”的处所动词用法的产生跟处所介词密不可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上述方言“从”的演变路径如(21)所示。

- (21) “从”:源点介词>处所介词>处所动词

3.3 与格介词>给予动词

在汉语及很多东南亚语言里,给予动词往往演变为与格介词。例如古汉语的“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给”等等。因为与格介词的语法化程度高于给予动词,所以“给予动词>与格介词”是典型的语法化演变。不过在某些汉语方言里,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相反的演变,即“与格介词>给予动词”的逆语法化。^⑦

^⑦ 鉴于下文讨论的临武土话“挨”和西南官话“跟”除与格介词和给予动词外还具有受益介词功能,不能排除其给予动词功能来自受益介词(而非与格介词)用法这种可能,因为概念上,给予动词与受益介词也是密切相关的。假果真如此,那么临武土话“挨”和西南官话“跟”经历的则是另一种逆语法化演变,即“受益介词>给予动词”。

3.3.1 挨

湖南临武(城关)土话阴平的“挨”[a³³]除用作“靠近”义动词外,还有给予动词和介词用法(李永明,1988)。例如:

- (22) 湖南临武(城关)土话(李永明,1988)
- a. 给予动词:挨我一本书给我一本书 (407)
 - b. 与格介词:挨书挨我把书给我 (378)
 - c. 受益介词:你挨我走你给我走 (354)
 - d. 处置标记:我挨碗打烂喋我把碗打烂了 (378)
 - e. 被动标记:我挨狗咬喋我被狗咬了 (378)

李永明(1988)的资料显示,临武(城关)土话“挨”[a³³]做介词时,可以有与格介词(如(22b))、受益介词(如(22c))、处置介词(如(22d))以及被动标记(如(22e))等功能;此外在这个方言里,阴平的“挨”还可以用作给予动词(如(22a))。王泽芳(2007)记录的临武大冲土话“挨”也有多种用法,其多功能模式与临武城关土话大同小异。例如:

- (23) 临武大冲土话(王泽芳,2007)
- a. 给予动词:挨我一本书给我一本书 (133)
 - b. 与格介词:借十元钱挨我借十元钱给我 | 芳芳唱只歌挨我听芳芳唱首歌给我听 (133)
 - c. 使役标记:我唔得挨她一个人在门口跑我不会让她一个人在外面跑 (133)
 - d. 被动标记:杯子挨飞飞打烂格了杯子被飞飞打破了 (132)
 - e. 工具标记:挨调羹舀汤吸用调羹舀汤喝 (128)

跟其他方言一样,临武土话阴平的“挨”[a³³]作为动词常见的意义是“靠近”,但“靠近”义如何发展出“给予”义呢?我们的推断是,临武土话“挨”[a³³]的“给予”义动词用法不是源自“靠近”义动词,而是由“挨”[a³³]的与格介词用法发展而来。理由是,第一,意义上,动词“挨”的“给予”义跟“靠近”义相去甚远,而跟与格介词基本相同。^⑧第二,句法上,在(23b)这类给予式里,当VP省略时与格介词“挨”就很容易被重新分析为给予动词,譬如:

- (24) a. 甲:借十元钱挨谁? 乙:挨我。
b. 甲:芳芳唱只歌挨谁听? 乙:挨我听。

至于临武土话“挨”[a³³]与格介词用法的来源,限于资料我们目前无法做出圆满的解答。不过,假如临武土话“挨”[a³³]曾有伴随介词用法,那么不排除“挨”[a³³]的与格介词用法与之相关,而“挨”的伴随介词最有可能源于“挨近/靠近”义动词。事实上,这些用法有可能在一个方言里共存,比如云南开远方言里阴平的挨[ai⁵⁵]就几乎具备了上述所有用法。

- (25) 云南开远方言“挨”[ai⁵⁵]的用法(据朱雨,2013)
- a. “靠近”义动词:他挨了墙慢慢呢蹲下去啦 (60)
 - b. 伴随介词:小李性格内向,不喜欢挨大家讨论问题 (61)
 - c. 比较介词:小妹呢个子已经挨我一样高啦 (60)
 - d. 关涉介词:我敢保证,他挨这件事不/冇得关系 (60)
 - e. 有生方向介词:大家先罢叫,听我挨大家解释一哈 (61)
 - f. 有生源点介词^⑨:他是个小气鬼,你咋个会挨他借钱啊 (61)

^⑧ 证据之一是,词典释义无论是给予动词还是与格介词,通常都用“给”来训释。

^⑨ 这里的“有生源点介词”(preposition of human source)指的是引介索取动作所指向的有生对象的介词,譬如“向同学借一本书”中的“向”。

- g. 受益介词:我有点事情,你挨我看一哈铺子嘛 (60)
- h. 受害介词:姐姐在学习,我们不要挨她搞乱啦 (60)
- i. 处置介词:这种辣椒挨我呢嘴都吃肿啦 (61)
- j. 并列连词:亲朋好友呢意见挨建议你得多听听 (62)

3.3.2 跟

据李炜、刘亚男(2015),在出版于1893年的《华西官话汉法词典》里,“跟”(kēn)除了“跟随”义动词外,还有给予动词、并列连词以及表达各种格功能的介词用法。^⑩ 例如:

(26) 《华西官话汉法词典》“跟”的用法(据李炜、刘亚男,2015:359)

- a. 给予动词:买东西不跟钱买东西不给钱(《华西·跟》206页)
- b. 与格介词:这股地方我照买价让跟你这个地方我按照买价让你(《华西·价》228页)
- c. 受益介词:跟他脱衣服替他脱衣服(《华西·脱》592页)
- d. 有生方向介词:这个事(这句话)你要跟我讲清楚这件事你要和我讲清楚(《华西·讲》233页)
- e. 有生源点介词:我的牛是跟人家令的我的牛是向人家借的(《华西·令》334页)
- f. 伴随介词:你跟我打伙开店子你跟我合伙开店(《华西·伙》113页)
- g. 比较介词:跟雪一样白和雪一样白(《华西·雪》477页)
- h. 并列连词:差人跟强盗是通的衙役和强盗是串通好的(《华西·通》593页)

李炜、刘亚男(2015)注意到,上述“跟”的给予动词用法以及与格介词和受益介词功能仍见于现代西南官话。^⑪ 例如:

(27) 现代西南官话“跟”的用法(引自李炜、刘亚男,2015:360)

- a. 给予动词:我同学跟了我一本书我同学给了我一本书
这个苹果跟你,那个苹果跟他这个苹果给你,那个苹果给他
跟一个苹果给一个苹果
(四川泸州、四川宜宾江安、贵州毕节)
- b. 与格介词:把盐拿跟我把盐递给我一下
我送几本书跟你我送几本书给你
(四川泸州、四川宜宾江安、贵州毕节、贵州遵义、湖北恩施建始)
- c. 受益介词:跟叔叔倒茶给叔叔倒茶
还不快点跟我站倒还不快点给我站住
(四川泸州、四川宜宾江安、贵州毕节、贵州遵义、湖北恩施建始、湖北宜昌、湖北荆州石首、湖北武汉汉口)

西南官话“跟”的给予动词用法从何而来?我们认为极有可能源自与格介词(或受益介词)。理由是:第一,在概念意义上,“跟”的“跟随”义与“给予”义几无关联,前者演变为后者缺乏基本的语义条件。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与格介词与给予动词意义基本相同,都有“给”的意义,差别只是句法行为的不同。第二,考察发现,在“跟”有给予动词用法的方言里,“跟”通常具有与格介词或受益介词用法(如上举西南官话);反之则不然:在“跟”具有与格介词或受

^⑩ 友生金小栋相告:《华西官话汉法词典》中给予动词和与格介词,用“跟”(记音是 Kēn, 205-206页)或“与”(167页),未见“给”。

^⑪ 宜宾方言研究专家左福光老先生指出(私人交流):宜宾方言(宜宾王场方言)表给予的动词是“kən⁵⁵”,可以说“kən⁵⁵我一本书(给我一本书)”。左老先生强调,宜宾方言表“给予”就用“kən⁵⁵”,只有一个读音,不用“给”。

益介词用法的方言里,“跟”未必具有给予动词用法,例如贵阳方言(汪平,1994:252)里,“跟”具有受益介词用法(“跟大家办事|你跟我写封信”)和与格介词用法(“跟他打个电话|送给他一支笔|把帽子给跟他|拿跟他三块钱”),但未见给予动词用法。第三,句法上,像“断十吊钱跟他判十吊钱给他”(《华西·断》603页,引自李炜、刘亚男,2015:359)这类结构式,其中的“跟”到底是与格介词还是给予动词,可能有不同的分析。事实上北京话里“送本书给他”中“给”究竟是给予动词还是与格介词,也是见仁见智。这足以说明,汉语与格介词和给予动词之间在概念意义和句法行为上都非常接近,同时也表明二者之间双向演变的可能性。

3.4 比较介词>比拟动词^⑫

在汉语以及东南亚语言里,比拟动词可以演变为比较介词,如汉语的“像、如、似”等。因为比较介词的语法化程度高于比拟动词,所以“比拟动词>比较介词”是典型的语法化现象。不过在汉语方言里也偶尔观察到相反的演变,即“比较介词>比拟动词”的逆语法化现象。

3.4.1 跟

朱德熙(1982a)和陆俭明(1982:247-252)注意到,现代汉语的“跟X一样”是一种有歧义的同形格式:

(28) A. 我的物理分数跟小张一样|他妹妹可高了,个儿跟他一样

B. 你看他又高又瘦,跟电线杆一样|他可狡猾了,跟狐狸一样

上面例子中,A式表示比较,强调等同;自然重音一定在“一样”上。B式表示比拟,强调相似;自然重音一定在X上。除了意义和语音,这两种格式语法上也有对立:第一,A式的“一样”能带“完全”“确实”“的确”一类修饰语,而B式的“一样”不能带这些修饰语。第二,B式的“一样”可用结构助词“似的”替换,整个格式的意思和重音不变;而A式的“一样”绝不能用“似的”替换。第三,A式有相应的否定形式,B式没有(陆俭明,1982)。基于上述证据,朱德熙(1982a:5)和陆俭明(1982:250)认为A、B两类“跟X一样”是两种不同的句法结构:A类是“状-中”结构,其中“跟”是介词,“一样”是形容词。B类是述宾结构,其中“跟”是动词,义为“像,好像”;“一样”是结构助词,同于“似的”。

考察发现,在北京方言里,B类“跟X一样”更多是说成“跟X似的”。例如:

(29) 你就一点好听的都没有,嘴跟粪缸似的。(王朔《空中小姐》)|他这两天夜里没少趴在枕头上哭,早上起来眼睛跟桃儿似的。(王朔《玩的就是心跳》)|她……拉着长音不满地说:“那么多事,跟妈似的。”(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那么,普通话以及北京话里,“跟”的这种比拟动词用法从何而来?陆俭明(1982:247-252)推断可能是由“跟随”义演变而来。^⑬不过我们觉得,“跟”的比拟动词用法更有可能是由“跟”的比较介词用法演变而来。第一,在语义上,相较于动词的“跟随”义,“比较”与“比拟”之间的概念距离要小得多,由“比较”演变为“比拟”似更自然。第二,句法条件上,这种演变的诱因之一也是VP省略。试比较:

^⑫ 这里的“比拟动词”指的是“如/如同、像/好像”一类动词。“比拟动词”只是方便的说法,其实这类动词也可以表示比较。

^⑬ 陆先生认为,从词义发展变化的角度说,动词“跟”由“跟在后面,紧接着向同一方向行动”这一意义引申出“像,好像”的意义是完全可能的、自然的。“请跟着我念”,是说1)我先念,大家随着念;2)我怎么念,大家也怎么念。这里包含有相一致的意思,“跟”所表示的“像,好像”的意义就是由此引申出来的。(陆俭明,1982:252)

- (30) a. 这姑娘跟花儿一样美 b. 这姑娘跟花儿一样 c. 这姑娘跟花儿似的

(30a) 因为形容词“美”的出现,“跟花儿一样”通常只能分析为介词结构(比况结构),其中“跟”应为介词。这类结构跟“那里的蔬菜跟水果一样贵”这类平比式句法上并无不同。(30b)中因为谓语“美”的省略,“跟花儿一样”重新分析为述宾结构,“跟”被重新分析为动词。到了(30c),上述重新分析已被扩展到其他语境,演变得以完成。

山东境内的一些中原和冀鲁官话方言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跟”的比拟动词用法:

- (31) 山东汶上方言(宋恩泉,2005)
- a. 比拟动词:他还不跟我哩他还不如我呢 (284)
 - b. 比较介词:他跟你般大他和你一样大 | 他跟你不般大他和你年龄不一样大 (285)
- (32) 淄川方言(孟庆泰、罗福腾,1994)
- a. 比拟动词:你还不跟我呢 | 你去不跟我去 (240)
 - b. 比较介词:他不跟你长得高(224) | 他家不跟您家干净 (240)
- (33) 临沂方言(马静、吴永焕,2003)
- a. 比拟动词:你去不跟我去你去不如我去 (214)
 - b. 比较介词:他跟你高 | 这里跟那里干净 (244)

因为这些方言里用如比拟动词的“跟”同时也有比较介词用法,基于前述证据,我们认为这些方言的比拟动词“跟”也应源自比较介词。

3.4.2 给

山东汶上方言的“给”[kei⁴²]是个多功能语素,除了虚词功能外还可以用作比拟动词:

- (34) 山东汶上方言(宋恩泉,2005)
- a. 伴随介词:他给你是朋友? (220)
 - b. 有生方向介词:有个事儿给你说 (220)
 - c. 并列连词:他给我都没去过北京 (220)
 - d. 比较介词:他给你不般大他和你年龄不一样大 (285)
 - e. 比拟动词:这闺女给男孩子样这闺女像男孩子一样

无独有偶,山东金乡方言(马凤如,2000)的“给”也有比拟动词用法:

- (35) 山东金乡方言(马凤如,2000:181)
- a. 比较介词:张三给李四般大张三跟李四一样大
 - b. 比拟动词:俺这儿媳妇给个闺女样我的这个儿媳如像个闺女似的 | 说得给唱的样说得像唱的一样

据马凤如(2000:181),金乡方言里上举 a 类例子中形容词不能省略,与之相反,b 类例子一般不带形容词(*俺这儿媳妇给个闺女样孝顺)。可见 a 类“给”一定也是比较介词,b 类“给”一定是比拟动词。

至于这两个方言“给”比拟动词的来源,参照3.4.1节“跟”的分析,我们认为源于比较介词。

4. 汉语逆语法化现象的初步解释

以上讨论了汉语方言中四种逆语法化现象,即“并列连词>伴随介词”、“处所介词>处所动词”、“与格介词>给予动词”和“比较介词>比拟动词”。考察发现,这四种逆语法化现象在其他语言中极为罕见。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汉语会发生这类跨语言罕见的逆语法化现象?

我们观察到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上述四种逆语法化演变中,输入端(演变前的成分)和输出端(演变后的成分)之间概念意义基本相同,二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语法属性(形态句法特性)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上述四种逆语法化过程中,实际发生改变的是源成分的语法地位

(介词范畴变为动词范畴或连词范畴变为介词范畴)。因此,如果能从类型学角度找到上述逆语法化演变的句法条件和类型动因,那么这几种“匪夷所思”的演变也就有望得到合理解释。

江蓝生(2014:490)敏锐地发现,“跟”“处所介词>处所动词”的演变导源于谓语成分的省略:“很显然,‘跟’由处所介词演变为存在动词是句子成分省略造成的,即‘跟 NPVP’(NP为处所名词)省略了谓语VP。如果我们给‘跟NP’补上一个VP,‘跟’就变回为处所介词了”。下面是江先生(江蓝生,2014:490)举的例子(标下横线者为增补的成分):

(36) 他跟乡下呢——他跟乡下住着呢

甲:你跟哪儿待着呢? 乙:跟家待着呢/跟办公室打字呢。

甲:我今年该退休了。 乙:不上班,天天跟家待着多好!

(37) 问:您哪儿住呢? 答一:跟家住呢。 答二:跟家呢。

(“答二”承上省略了谓语动词“住”,使“跟”用作存在动词。)

句子成分(谓语VP)的省略当然是处所介词(“跟”)变为处所动词的重要条件或触发动因。不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汉语句子成分(谓语VP)可以省略?为什么汉语VP省略可以导致处所介词变为处所动词,而其他语言(如英语、俄语)即使可以省略VP也不太可能导致这类演变发生?下面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

4.1 话语规约

“话语规约”(discourse convention)是Bybee(1997)使用的一个术语,大约是指一种语言的使用者普遍遵守的话语表达的倾向或规范。^⑭ Bybee(1997:33-35)在论及汉语这类分析性语言为什么未能产生强制性语法范畴时,推测可能跟这类分析性语言的话语规约有关。她认为汉语这类分析性语言的话语规约是避免信息冗余,对话语中的冗余信息容忍度极低,语素特别是语法语素很难被冗余性使用,甚至很多语法语素也只是在其语义内容非冗余、对新信息有所贡献的时候才被使用,也就是说,语法语素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话语驱动而非语法规定的。另一方面,在像汉语这类分析性语言的话语交际中,由于缺少强制性语法提示(grammatical cue),言谈事件的参与者往往要综合利用包括上下文语境和词汇语义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话语因素来对句子进行语义解释。也就是说,在话语理解过程中,受话人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推理选择。

我们认为Bybee(1997)对汉语话语规约的刻画是可信的。事实上,汉语的这种话语规约可能由来已久,譬如先秦以来很多先哲所强调的“辞达而已”、“言约意丰”、“言不尽意”、“以意逆之”等原则,虽然主要是从文章学、修辞学和训诂学的角度提出的,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汉语话语交际中“避免冗余信息”和“具有多种推理选择”这样的倾向。

正如Bybee(1997)所指出的,在一些综合性语言里,由于话语规约允许语素特别是语法语素冗余性使用,语言成分的隐现在话语理解中就显得非常重要,听话人有一种规约性老套推理:“若X未说出,则意味着非X”。所以在这类语言里,话语成分的省略是极受限制的。而在汉语这类分析性语言里,由于存在“避免使用冗余信息”这种话语规约,听话人并没有“若X未说出,则意味着非X”这样的默认推理,说话人在话语表达时可以省略很多话语成分,甚至借助上下文语境和在线交际情景,删略一些负载非冗余信息的成分。正因为如此,汉语的很多结构式在口语里都可以删略谓词。例如:

^⑭ Bybee(1997)未给discourse convention定义,本文的界定是基于Bybee(1997)相关论述作出的。

- (38) a. 无谓把字句:我把你这个小丫头[]!
 b. 无补“得”字句:看他气得[]!
 c. 特殊“呢”问句:甲:张三出国了。
 乙:李四[]呢?
 d. 处所结构式:甲:你在哪儿找到的?
 乙:在宿舍[找到的]。

实际上,在汉语里不仅谓词删略司空见惯,主宾语等论元成分的省略似更寻常。以致 Bisang(2006:587-595)主张“论元的可删略性”是汉语及大陆东南亚语言的一个非常显著的区域特征。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汉语里只要无伤信递(communication),一切皆可省略。由此可见,汉语这种不允许冗余信息的话语规约,一方面阻碍了形态标记的产生和强制性范畴的形成,另一方面也促动了汉语逆语法化现象的发生(避免冗余信息导致谓语成分省略,而后者直接诱发逆语法化现象的发生)。

4.2 形态类型

在一般形态句法学框架里,动词属于“变形词”(variable word),附置词(包括前置词和后置词)以及连词属于“不变形词”(invariable word)。在具有屈折形态的语言里,动词进入话语是要带上形态标签的。譬如在英语里,动词在定式小句(finite clause)里必须带上屈折词尾。所以在这类语言里,变形词与不变形词在形式上是有明显区别的。而在汉语这种分析性语言里,由于缺少屈折形态,动词在话语里并无形态标签,换言之,变形词与不变形词形式上毫无区别。我们认为,正是因为动词(变形词)和介词(不变形词)在形态上毫无区别,所以在特定的句法环境里,动词可以变为介词,同样,假如具备合适的语义和句法条件,介词也可以被重新分析为动词。另一方面,在英语这类有屈折形态的语言里,由于变形词和不变形词形态有别,所以,不但介词无法重新分析为动词,甚至定式动词也无法直接演变为介词。这就是为什么在英语里,动词只有变为非定式形式(比如分词)才可以有条件演变为前置词(譬如 considering, given)。由此可见,在像英语这类具有屈折形态的语言里,变形词和不变形词的形态差别决定了这类语言即使可以省略 VP,其介词(处所/与格/比较介词)也不可能被重新分析为动词(处所/给予/比拟动词)。^⑮与之相反,在汉语这类缺乏屈折形态的语言里,因为没有变形词和不变形词的对立,动词和介词形态上毫无区别,因此句子的 VP 一旦省略,介词(处所/与格/比较介词)就有可能被重新分析为动词(处所/给予/比拟动词)。

4.3 句法类型

4.3.1 汉语介词和连词的特殊地位

现代汉语的“介词”其实是一种过渡性句法范畴,至少在句法行为上同时具有动词和介词的语法特性。吕叔湘、朱德熙(1952/2002:9)把“把、被、从、对于”这类介词称为“副动词”,主张“……不如还是把它们归在动词这个大类的底下”。丁声树等(1961/1999)初版也把介词称为副动词,但结集出版时将“副动词”改为“次动词”,^⑯该著也认为“次动词也是动词的一

^⑮ 英语这类语言里省略 VP 后介词不能变为动词,还有一个原因:在英语这类语言里介词结构本身是附接语,没有述谓性,介词结构要作谓语必须加上系词。当然这也是英语和汉语这两类语言句法类型差异的一种表现。

^⑯ 丁声树等(1961/1999:iii):原《讲话》的“副动词”现在改称“次动词”,因为“副动词”这个名称容易误会成“副词性的动词”,并且也容易和俄语语法中的“副动词”混淆。

种”。^{①7} 龙果夫(1958:112-113)似乎也不认为现代汉语里存在纯粹的介词,他把“在、从、把、被、和”这类介词称作“动词·前置词”,认为这类词“在动词之内占据特殊地位”,是一种“能有实义词和辅助词两种作用的动词”。

此外,赵元任(1979)、朱德熙(1982b)把“在家里做饭”这类“PP-VP”结构视为连动式。可见他们两位都主张,现代汉语介词结构 PP 是具有陈述功能的述谓成分而不是典型的附接语(adjunct),而其中的介词(包括本文讨论的处所/与格/比较介词)当然具有动词特性。

“副动词”、“次动词”以及“动词·前置词”云云,这些术语本身就说明现代汉语介词既非典型的动词,亦非纯粹的介词,实际是一种“动—介”连续统的中间阶段。事实上,赵元任(1979:330)早就强调:“……汉语介词,无论在分类上或是在历史上,都有一种过渡的性质……”。

因为,现代汉语的“介词”作为一种次动词,处于“动—介”连续统的中间阶段,本质上是一种过渡性句法范畴,所以在现代汉语里只要具备合适的语义和句法条件,介词重新分析为动词不是没有可能。

跟介词一样,汉语的连词(尤其并列连词)也是一种过渡性句法范畴。赵元任(1979:350)早就指出:“……汉语的连词不容易跟介词或副词区别开来。例如‘你跟他一块儿走’,‘跟’可以是连词,可以是介词……事实上,汉语连词的地位如此的不确定,以至于龙果夫不承认它是一个单独的词类”。赵元任(1979:351)把“和”“跟”“同”这类连词叫“介词性连词”,因为它们“是既可以作介词又可以作连词的”。所谓“介词性连词”,应该是说这类连词带有介词的性质,兼有介词和连词的特性。此外,江蓝生(2014:483)也认为汉语并没有印欧语那种跟介词对立的连词,汉语的并列连词其实是伴随介词的一个特殊的次类。她将现代汉语“和”“跟”“同”这类兼具伴随介词和并列连词两种功能的虚词称为“连—介词”。

因为汉语的并列连词是一种过渡性句法范畴,处于“介词—连词”连续统的中间阶段,所以在汉语里伴随介词语法化为并列连词是反复可见的演变现象,另一方面,只要具备合适的语义和句法条件,并列连词重新分析为伴随介词也不是没有可能。

4.3.2 伴随结构的语序

吴福祥(2003b)在讨论 SVO 型语言中伴随介词两种不同演变模式(即汉语型的“伴随介词>并列连词”和英语型的“伴随介词>工具介词>方式介词”)时,发现导致伴随介词在汉语型语言和英语型语言里两种不同演变模式的原因是伴随结构(由伴随介词+伴随成分构成的介词短语)的位置:在具有汉语型演变模式(即:伴随介词>并列连词)的语言里,伴随结构通常前置置于谓语动词(如汉语),与此相反,在具有英语型演变模式(即:伴随介词>工具介词>方式介词)的语言里,伴随结构通常后置于谓语动词(如英语)。在伴随结构前置型语言里,如果伴随介词之前没有修饰性成分共现,伴随结构和主语名词在线形序列上便彼此邻接(即“ $N_1 + \text{PREP.} + N_2 + \text{VP}$ ”)。在语言交际中,“ $N_1 + \text{PREP.} + N_2 + \text{VP}$ ”序列中的两个事件发起者(N_1 、 N_2)—

^{①7} 丁声树等(1961/1999:95)指出:

“次动词也是动词的一种,不过有两点和一般动词不同。第一,次动词大都不做谓语里的主要成分,比方说,‘我把信写好了’,光说‘我把信’就不成话。……第二,次动词后面总要带宾语,而且一般都是体词宾语。‘我把信写好了’不能说‘我把写好了’。……能带体词宾语是一般动词的性质,但是不做谓语里的主要成分,又跟一般动词有区别,所以叫做‘次动词’。”

且被交际参与者视为一个整体,那么 N_1 和 N_2 就有可能被重新分析为一个并列结构,原来的伴随介词也就被重新分析为并列连词。另一方面,在伴随结构后置型的语言里,由于伴随介词引导的伴随成分和主语名词之间被谓语动词阻隔(即 $N_1 + VP + PRE. + N_2$),伴随介词如果发生语法化,它的输出成分不可能是并列连词,而只能是表示其他格功能的介词。^⑩

进一步考察发现,汉语的这种伴随结构语序不仅有利于“伴随介词>并列连词”的语法化,而且很大程度上也为“并列连词>伴随介词”的逆语法化提供句法条件:在包含并列结构的句式里,当并列结构处于主语位置(“ $N_1 + CONJ. + N_2 + VP$ ”)时,线性序列上便和包含伴随结构的句式(“ $N_1 + PREP. + N_2 + VP$ ”)同形,加上前面提及的并列连词和伴随介词概念意义相同、语法特性相近(并列连词具有介词特性),所以并列连词具备了被重新分析为伴随介词的必要条件。也许正因为如此,汉语很多方言里像“张三跟李四一起去”这类句子中的“跟”是伴随介词还是并列连词,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析。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像在汉语这种伴随结构前置的语言里,“ $N_1 + X (= PREP./CONJ.) + N_2 + VP$ ”中 X 句法槽内,伴随介词和并列连词之间的演变有可能是双向的。反观英语,伴随结构的后置不仅堵塞了“伴随介词>并列连词”的通道,同时也消除了“并列连词>伴随介词”的可能,换言之,在英语这种伴随结构后置的语言里,“伴随介词>并列连词”和“并列连词>伴随介词”都是不可能的。

4.4 整体类型学特征

以上,我们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汉语方言为什么会发生上述四类与介词和连词相关的逆语法化现象。归根结蒂,我们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跟汉语的整体类型学(holistic typology)特征相关。首先,因为汉语在形态类型上属于分析-孤立型语言,在这样的语言里变形词和不变形词不加区分,动词和介词形态无别,这就为二者的互变扫清了形态上的障碍。其次,汉语是一种语用凸显性语言,在这样的语言里,语用法往往压倒语法,话语表达更多的是语用驱动而非语法规定的,话语规约避免信息冗余,成分删略普遍可见。再次,汉语是一种低语法化的语言,缺乏强制性语法范畴,介词和连词尚未完成演化阶段,语法化程度不高。

5. 结语与余论

本文在前人基础上讨论汉语方言里四种逆语法化演变,即“并列连词>伴随介词”、“处所介词>处所动词”、“与格介词>给予动词”和“比较介词>比拟动词”,并从话语规约和语言类型角度进行了初步解释。主要观点是,这些逆语法化演变的发生与汉语独特的类型特征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上述四种特异的语法演变本质上导源于汉语特异的类型特征。

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第一,为什么上述四种逆语法化现象罕见于世界语言,在普通语言学文献中鲜有报道?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上述四种逆语法化所需要的特定句法条件和相关类型特征,在世界绝大多数语言中难以具备。比如一个语言若要发生“并列连词>伴随介词”,前提条件是:(i)该语言是 SVO 型语言且伴随结构(介词结构)前置;(ii)缺乏典型的并

^⑩ 有些英语型语言(即伴随结构后置型语言),其伴随介词也可以语法化为并列连词。比如西非约鲁巴语的 *kpèlú*、埃维语的 *kpè*(Lord, 1993)以及前文提到的豪萨语的 *da*(Schwartz, 1989)。这是因为在这类语言里,伴随结构可以通过左向移位(left-dislocating)而前置于 VP。所以英语型的语言(即伴随结构后置型语言),除非允许对伴随结构进行左向移位的句法操作,其伴随介词才有可能拥有“伴随介词>并列连词”这一演变模式。(参看吴福祥, 2003b: 462-469)

列连词范畴,它的并列连词本质上是“介词性连词”或“连-介词”(具有部分介词的特性)。需要指出的是,具备这两种前提条件(尤其是条件(i))的语言在世界语言中极为罕见(吴福祥,2012)。又比如一个语言若要发生“处所介词>处所动词”、“与格介词>给予动词”和“比较介词>比拟动词”,前提条件是:(i)该语言是分析性语言,缺少屈折形态变化,不存在变形词和不变形词对立;(ii)该语言缺乏典型的附置词范畴,其所谓的“介词”本质上是一种“次动词”(具备动词的部分特性);(iii)该语言的话语规约避免信息冗余,成分删略普遍可见。不难想象,具备这些前提条件的语言在人类语言中当然也非常少见。由此可见,本文讨论的四种逆语法化现象之所以罕见,是因为具备这些演变条件(如表1所示)的语言在世界上极其罕见。

表1 四种逆语法化发生的句法条件和类型动因

逆语法化过程	演变发生的前提条件
并列连词>伴随介词	1) SVO 型语言且伴随结构(介词结构)前置 2) 并列连词范畴是“介词性连词”(未脱离介词特性)
处所介词>处所动词	3) 分析性语言,缺少屈折形态变化,未有变形词和不变形词对立
与格介词>给予动词	4) 缺乏典型附置词范畴,介词本质上是“次动词”(未脱离动词特性)
比较介词>比拟动词	5) 话语规约避免信息冗余,成分删略普遍可见

第二,既然在汉语中,并列连词和伴随介词、处所介词与处所动词、与格介词和给予动词以及比较介词和比拟动词之间的演变可以是双向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语法化的单向性原则不能成立?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第一,如前所述,本文描述的四种逆语法化演变实际上在人类语言中十分罕见,而相反的演变则普遍可见。单向性只是一种普遍的原则而非绝对的规则,因此它是允许极少数例外的。第二,对于本文讨论的四种逆语法化演变,我们可以清晰地描述其发生的句法条件和类型动因。一个规则的例外,若能找到其发生的条件并能做出动因和机制的解释,那么这个例外也就不再成为规则的反例。这或许就是新语法学派强调的“语音规例无例外”、“例外也是有规律的”的理据所在。

参考文献

- 曹延杰 1991 《德州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陈刚 1985 《北京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
 储泽祥 丁加勇 曾常红 2006 《湖南慈利通津铺话中的“两个”》,《方言》第3期。
 丁声树等 1961/1999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
 傅民 高艾军(编) 1986 《北京话词语》,北京大学出版社。
 江蓝生 2012 《汉语连-介词的来源及其语法化的路线和类型》,《中国语文》第4期。
 江蓝生 2014 《连-介词表处所功能的来源及其非同质性》,《中国语文》第6期。
 李荣(主编) 2002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宗江 2004 《语法化的逆过程:汉语量词的实义化》,《古汉语研究》第4期。
 金小栋 吴福祥 《汉语方言多功能词“跟”的语义演变》,未刊。
 李炜 刘亚男 2015 《西南官话的“跟”——从〈华西官话汉语词典〉说起》,《中国语文》第4期。
 李永明 1988 《临武方言——土话与官话的比较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刘翠香 2004 《山东栖霞方言中表示处所/时间的介词》,《方言》第2期。
 龙果夫 1958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第一卷词类),郑祖庆译,科学出版社。
 吕叔湘 朱德熙 1952/2002 《语法修辞讲话》,辽宁教育出版社。
 卢小群 2007 《湘语语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栾瑞波 2008 《莱阳(石河头)方言初探》,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罗福腾 1997 《牟平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罗耀华 周晨磊 2013 《“抑”的去语法化》,《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陆俭明 1982 《析“像……似的”》,《语文月刊》第4期。又见陆俭明、马真《现代汉语虚词散论》,语文出版社1999年出版。
- 马凤如 2000 《金乡方言志》,齐鲁书社。
- 马静 吴永焕 2003 《临沂方言志》,齐鲁书社。
- 孟庆泰 罗福腾 1994 《淄川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 聂志平 2005 《黑龙江方言词汇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
- 钱曾怡 1997 《济南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覃东生 2007 《宾阳话语法研究》,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任林深 1987 《山西闻喜话常用介词例析》,《山西师大学报》第4期。
- 宋恩泉 2005 《汶上方言志》,齐鲁书社。
- 苏晓青 吕永卫(编) 1996 《徐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汪平 1994 《贵阳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王菲宇 2012 《从语义地图看汉语“和”类词》,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王淑霞 1995 《荣成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 王希哲 1991 《左权方言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王泽芳 2007 《湖南临武(大冲)土话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吴福祥 2003a 《关于语法化的单向性问题》,《当代语言学》第3期。
- 吴福祥 2003b 《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兼论SVO型语言中伴随介词的两种演化模式》,《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一),商务印书馆。
- 吴福祥 2005 《汉语语法化演变的几个类型学特征》,《中国语文》第6期。
- 吴福祥 2010 《东南亚语言“居住”义素的多功能模式及语法化路径》,《民族语文》第6期。
- 吴福祥 2012 《试说汉语几种富有特色的句法模式——兼论汉语语法特点的探求》,《语言研究》第1期。
- 许宝华 宫田一郎(主编)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
- 阎浩然 2009 《吴桥方言语法记略》,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桂权 2005 《资源延东直话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
- 张立昌 秦洪武 2011 《逆语法化研究——试论古代汉语句中语气词“也”演变的过程、条件及动因》,《宁夏大学学报》第5期。
- 张琳琳 2013 《山东运河流域方言语法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秀松 2014 《疑问语气副词“究竟”向名词“究竟”的去语法化》,《语言科学》第4期。
- 张谊生 2011 《略谈汉语语法化研究中的若干疑难现象》,《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 赵秀莉 2006 《曲阳话与普通话语法差异研究》,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赵元任 1979 《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a 《说“跟……一样”》,《汉语学习》第1期。
- 朱德熙 1982b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朱雨 2013 《开远方言中“挨”的介词功能与连词功能》,《红河学院学报》第5期。
- 宗守云 2012 《类后缀“一族”及其逆向语法化》,《百色学院学报》第1期。
- Bisang, Walter 2006 Southeast Asia as a Linguistic Area. In Brown, Keith (ed.),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nd edition), Vol. 11, 587-595. Oxford: Elsevier.
- Bybee, Joan 1997 Semantic aspects of morphological typology. In Bybee, Joan, John Haiman and Sandra A. Thompson (eds.), *Essays on Language Function and Language Type*, 25-37. Amsterdam; Philadelphia: 2017年第3期

-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Campbell, Lyle (ed.) 2001 Grammaticalization: A critical assessment, *Special Issue of Language Sciences*, Vol. 23. 2-3.
- Fischer, Olga and Anette Rosenbach 2000 Introduction. In Fischer, Olga, Anette Rosenbach and Dieter Stein (eds.), *Pathways of Change: Grammaticalization in English*, 1-37.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Haspelmath, Martin 1999 Why is grammaticalization irreversible? *Linguistics*, 37.6: 1043-1468.
- Haspelmath, Martin 2003 The geometry of grammatical meaning: Semantic maps and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In Tomasello, Michael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Vol.2, 211-242.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Haspelmath, Martin 2004a On directionality in language change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grammaticalization. In Fischer, Olga, Muriel Norde and Harry Perridon (eds.), *Up and down the Cline: The Nature of Grammaticalization*, 17-4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Haspelmath, Martin 2004b Coordinating constructions: An overview. In Haspelmath, Martin (ed.), *Coordinating Constructions*, 3-3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Haspelmath, Martin 2007 Coordination. In Shopen, Timothy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Linguistic Description* (2nd edition), Vol. II: *Complex Constructions*, 1-51. Cambridge: CUP.
- Heine, Bernd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In Joseph, Brian and Richard Janda (eds.), *The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575-601. Blackwell Publishing.
- Heine, Bernd and Mechthild Reh 1984 *Grammaticalization and Reanalysis in African Languages*. Hamburg: Helmut Buske Verlag.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ü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pper, Paul and Elizabeth C.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pper, Paul and Elizabeth C.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hmann, Christian 1995[1982]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 Munich: Lincom Europa.
- Lord, Carol 1993 *Historical Change in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Norde, Muriel 2009 *Degrammatic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ulleyblank, Edwin George 1986 The locative particles YÜ 于, YÜ 於, and HU 乎.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6.1: 1-12.
- Ramat, Paolo 1992 Thoughts on degrammaticalization. *Linguistics*, 30: 549-560.
- Schwartz, Linda 1989 Thematic linking in Hausa asymmetric coordination. *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s*, 20: 29-62.
-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Bernd Heine 1991 Introduction. In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1, 1-14.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